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编

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
中国革命史
新论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共产国际、联共(布) 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

(第一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共产国际与中 编
国革命研究专业委员会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 第1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研究专业委员会编.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4

ISBN 7-80199-004-8

I. 共… II. ①中…②中… III. ①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学术会议—文集②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6-53②D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3865 号

书 名: 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第一集)

作 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研究专业委员会

责任编辑: 谭一青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390千字

印 张: 16.75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0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99-004-8/K·3

定 价: 48.00元

此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 (010)82517246, 82517244

目 录

在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九次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 陈 威 1

在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九次学术研讨会

闭幕式上的讲话 黄修荣 9

论现代化视角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双重影响 汤 涛 15
“旅俄华工联合会”

——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创建的桥梁 任贵祥 26

从中、俄文材料之比较看中共广州地方早期组织

的创建 曹 直 42

论越飞关于孙中山吴佩孚联合统一中国的政策 李良明 61

试析共产国际、苏俄联孙策略的确立 杨建英 77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苏俄对吴佩孚的统战

及失败 徐再波 张 华 86

共产国际与中共二大对国家结构形式的构想 陈 夕 95

共产国际的影响与中共二大在民族地区实行联邦制

主张的提出 周忠瑜 109

共产国际的帮助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程昭星 118

从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看所谓陈独秀的

“二次革命论” 王德京 周承恩 127

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军事运动 肖 甦 145

从共产国际对陈独秀“退出国民党”主张的压制

看大革命失败的责任	唐正芒 158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旧三民主义革命性不彻底 的“忽略”	罗重一 169
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	李 颖 183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之间的 组织关系	姚金果 200
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初步探索与共产国际	曹 军 215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问题指导思想 的演变	王志刚 226
论共产国际对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与土地革命关系 的认识	朝泽江 243
共产国际、联共（布）应对大革命的失败负 主要责任	苏 杭 259
大革命时期斯大林为什么始终坚持共产党必须留在 国民党内	杨云若 270
斯大林对中国大革命的功过是非	张寿春 292
论马林与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工作	蔡 丽 307
鲍罗廷在中国大革命中的历史功过评析	吴明刚 318
试论鲍罗廷对国民党的政治影响力 （1925. 3 - 1926. 2）	翟清华 331
鲍罗廷与整理党务案	张留见 赵绍利 346
瞿秋白与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张秋实 352
论大革命失败前后斯大林、共产国际制定中国革命 政策的出发点	钟真真 370
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 中心”的策略转变	张喜德 381
论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对中国革命的负面 影响	林玉飞 399

广州起义中的盲动错误与共产国际

——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

档案资料丛书》第7册	佟英明 409
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的再研究	王新生 420
对待中国富农的“左”倾政策渊源于共产国际	盖 军 43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	刘宋斌 451
中国革命进程对共产国际指导的影响	王盛泽 477
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高云鹏 488
俄罗斯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新 进展	马贵凡 497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九次学术研讨 会综述	姚金果 513
后 记	523

在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 第九次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陈 威

同志们：

筹备已久的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九次学术研讨会，今天在祖国的南疆——美丽的海南三亚开幕了。首先，我代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并受孙英主任委托，同时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海南和三亚的各位领导，有关部门和省史志工作办公室、三亚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为开好这次会议所作的精心安排表示衷心感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论文入选同志，表示诚挚欢迎和崇高敬意！

从1997年召开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八次学术讨论会至今的五年，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团结奋进、开拓创新，克服各种困难和风险胜利前进的五年，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并取得举世公认伟大成就的五年。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我国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2002年11月，我们党胜利召开了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集中全党智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顺利地实现了

中央领导层的新老交替。2003年3月，又成功召开了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把党提出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变为国家和人民的意志，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两会”精神，满怀信心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这五年，中央对党史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98年10月，江总书记致信中央党史研究室深刻指出：“学习理论要同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的大会上，江总书记又作了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党八十年奋斗历程和历史经验。胡锦涛、曾庆红同志继1999年11月接见全国党史工作者代表之后，2001年6月，又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十六大后，庆红同志再次接见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代表。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审定《中国共产党简史》，批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出版。所有这些，都是对全国党史工作者的极大鼓励和鞭策，全国党史研究和宣传工作，呈现出一派生机与活力。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召开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九次学术研讨会，对于总结经验，以史为鉴，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很有意义的。对学会的工作来说，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召开这次学术研讨会，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检阅1997年第八次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学术讨论会以来研究工作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果；二是经民政部批准，成立隶属于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专业委员会”，以利于这项工作更好的开展；三是在这次研讨会的基础上，把若干篇基础好的优秀论文进行提炼、加工、升华，为明年在北京召开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做好准备。

为了把这次研讨会开好，我们期望与会的同志，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研究第一手历史资料，提倡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力求正确地反映历史本来面目，为现实提供历史鉴戒，推动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迈上新的台阶。

下面我想着重谈谈 1997 年以来，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这一课题的研究进展。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是中共党史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五年来，在领导的重视和党史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水平，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首先，是资料的发掘和整理。研究历史是离不开第一手资料的。恩格斯说过，真理就是用事实本身说话。作为历史发展过程来龙去脉原始记载的档案，在历史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凭证功能和重要的参考价值，是历史过程最珍贵的记录。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及时组织力量翻译和编辑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 至 12 卷，是在苏联解体后，根据公布的大量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绝密档案编辑而成的，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为深入研究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它的翻译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共历史研究中档案文献资料相对短缺或开放使用不够的缺陷，为深入研究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套很有价值的档案资料丛书的公开出版，推动了对民主革命时期许多重大党史问题的研究，把有关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广大研究工作者根据新的史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新的研究课题，涌现出

一批新的研究成果。这次研讨会就收到了全国各地送交的论文 72 篇，经学术组初评和复评，共有 37 篇论文入选。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讨了 1920 年至 1931 年间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不少论文运用了新的档案材料，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新见解。

另，据不完全统计，从 1997 年至 2002 年，各主要期刊共发表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论文近 150 篇。由于一批关键性档案资料的公布，在诸如中共建党过程中共产国际和俄共的作用，共产国际、苏联对孙中山的帮助，以及对冯玉祥国民军的支持和援助，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共产国际、苏联与东北抗日斗争等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上，也有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更为可喜的是，丛书的出版和研究的新进展，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中国共产党简史》和修订《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提供了重要依据，使有关问题的论述更加符合历史实际。比如，《简史》在讲到大革命失败原因时，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这段带有结论性的话，因为比较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因而受到读者的好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修订，工程浩大，历时数年。根据这套丛书公布的档案资料，对一些问题作了重大的修改，几乎各编都增补了一些重要内容。

比如，第一编“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关于“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有的专家认为，它是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组织轻视的一种统称。由于当时的党组织并不叫这个名称，这次修订，将各地

“共产主义小组”，一律改为各地“党的早期组织”。

第二编“党在大革命时期”。对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都作了比较充分的叙述，以十分翔实的史料说明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对陈独秀问题，根据史料作了较大的修改，将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主要是基于下述分析：一是，要肯定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建党，直至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是有很大贡献的。二是，根据这套档案资料，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对于党的创立、对于党领导的早期革命斗争，特别是大革命运动，既有指导正确的一面，也有指导不正确的一面。这指导不正确的一面，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犯的错误有密切关系。比如，被看作陈独秀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即所谓“三次大退让”，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直接掌握武装等等，都受到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三是，在大革命的紧要关头，未能挽救革命，固然陈独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跟共产国际的指导也有关系。正如乔木同志讲的，“当时形势瞬息万变，从国外的国际组织来指导一个国家的革命，无论什么天兵天将都不能做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是有责任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7页）何况，根据阶级力量的对比，大革命的失败也是难以避免的，不能把责任都推到陈独秀一个人身上。

第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原上卷的一些说法有明显的改变。比如，在处理这个时期党内三次“左”倾错误时，力求正确看待和把握我们党的失误和党内一些领导同志所犯错误的关系，在指出三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的同时，也把这个时期党的领导人的错误看作是探索过程中的错误。这些错误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主客观原因，某些错误则是难以避免的。为此，根据三次“左”

倾错误的不同情况和不同危害程度，作了比较大的改动：在标题上作了弱化处理，三次“左”倾错误都不上章标题，只上节标题；在节标题上也作了区别，即对第一次，只称“‘左’倾盲动错误”，不出瞿秋白同志的名字；对第二次，称“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不出“主义”二字；对第三次，则继续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文中的叙述也注意掌握分寸，力求符合历史实际。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引用了较多的档案资料介绍党中央的决策过程，说明这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做出的决定，而不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

此外，关于抗战胜利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写得比较客观、具体，还增写了1949年1月底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会谈的内容，指明这次会谈对斯大林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内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近几年取得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新进展、新成果还很多，我就不赘述了。

当然，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实在是太重要了。大家都清楚，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二大时起，曾经长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接受它的指导与帮助。共产国际不仅指派代表协助工作，而且从干部培养到领导核心的确定，从指导思想到政治策略的制定，从财政支持到军事指挥等等，几乎是无所不包、什么都管，而且时间长达20年。不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就无法真正弄清二三十年代甚至包括四十年代前期中共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发生的原因及其来龙去脉。正如“历史决议”指出的，“主要在本世纪（20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

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研究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就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甚至还可以延伸地说，不懂得这层关系，就不会真正了解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就不会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涵。

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还涉及到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政党史、中国军事史、中外关系史，以及共产国际史、联共（布）党史等学科内容，实际上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深入研究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弄清楚它们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影响，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需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胡乔木同志曾经说过：“确实，共产国际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帮了正忙，但是，恐怕帮的倒忙比帮的正忙要大得多。”“第三国际一成立，就强调民主集中制，就是国际范围里面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国际范围的集权制加上党内的集权制。”“苏联党的那种模式，确实对于中国党影响是非常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消极的东西，对于中国党历史上的发展的影响绝不能小看。我们并不要把我们的错误推给人家，把我们的责任推给人家，但是，客观的历史的影响是不能否认的”^①。乔木同志的这段论述是很深刻的，对我们如何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

早在党史学会成立之前，李新同志和黎澍同志就提出过要重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从1980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成立以来，历届学会的主要领导，对这个专题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视

^①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的。廖盖隆同志在资料比较匮乏的困难条件下，连续主持了多次学术讨论会，推动了全国研究工作的开展，培养了一批研究人员。可惜，盖隆同志已离开了我们，老一辈研究工作者大多已年过七十，而今天的研究条件，跟过去比，不知好了多少。当务之急，是培养一批年轻的研究人员，把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深入下去。至于说到如何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希望在座的专家多出主意。我不敢班门弄斧。但我想，在科学研究的路上，没有捷径可走，要想有所前进，第一，要有对事业的执著追求。第二，要坐得住冷板凳。如范老所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整天想着外部的世界很精彩，内心很浮躁，急功近利，是不会有成就的。第三，要有正确的方法。要弄清历史脉络，对史料进行认真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鉴别和分析，还要有政治上的观察和把握，才能写出史论结合的好文章。我们召开这次学术研讨会和成立专业委员会，目的也是为一代新人脱颖而出创造一些条件。

最后，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有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在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 第九次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黄 修 荣

同志们：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九次学术研讨会就要闭幕了。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就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虽然时间很短，但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已经达到会议的预期目的。

在这里，我向为开好这次会议辛勤工作的海南省史志工作办公室、三亚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和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这次会议是继 1997 年第八次学术研讨会之后，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又一次盛会。参加这次会议的论文作者来自全国 13 个省、市、自治区，涉及中央机关、大专院校、部队院校、地方党史办和地方党校等部门。大家共聚一堂，畅所欲言，使这次学术研讨会开成了一个互相切磋，交流研究心得的会议，开成了一个互相帮助，共同推动这一研究课题不断深化的会议。

这次会议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选题范围比较广，角度也比较新。

这次会议入选的 37 篇论文，几乎涉及到 1920 - 1931 年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方方面面：有共产国际、苏俄对吴

佩孚、孙中山的政策；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军事运动；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土地问题；共产国际代表对国民党的影响；共产国际、斯大林对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斯大林、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产生等。在这些问题上，研究人员站在新世纪、新千年的高度，运用新的档案资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们还高兴地看到，与会同志在注重研究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同时，还扩展了视野，对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国社会、经济、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也进行了考察。

此外，这次会议在人物研究方面也有新的拓展。以前，人们注重的是斯大林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对于其他重要人物的研究较少。这次会议入选的论文，除了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斯大林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外，还涉及到马林、越飞、鲍罗廷等人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陈独秀、瞿秋白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关系等。

第二，学术气氛浓，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和观点。

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之上。近年来，俄罗斯方面新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陆续由我们翻译出版，这为我国研究者提供了相当珍贵的档案资料，从而大大推动了这一课题的研究。这次会议入选的论文，绝大多数利用了这批档案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其中主要有：

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军事运动。以前对这个问题探讨得比较少，人们总的印象是共产国际、苏联只重视国民党的军事工作和军队建设，不支持中共的军事工作。这次会议上，有人对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笼统地说苏联和共产国际不重视中共的军事工作是不对的。从中共建党到五卅运动，它们对中共军事工作确实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但从五卅

运动到四一二政变，它们已将中共军事工作提到应有的地位，从多方面给予指导，从而使得中共在军事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建立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对冯玉祥国民军进行争取和改造、建立中共中央军事部并开展工作等。但四一二政变之后，它们对中共军事工作指导又严重右倾，给革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关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的组织关系。以前我们对共产国际与中共的组织关系比较清楚，知道从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两者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对于联共（布）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联共（布）与中共的关系，还不是十分清楚。这次会议有人依据新公布的档案资料，通过对这三者之间组织关系的分析，认为联共（布）在共产国际内部实际上是处于决策者和领导者的地位，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多数情况下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制定的，中国共产党既受共产国际领导，也受联共（布）的指导。而这种关系，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有很大影响。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问题。统一战线和土地革命是中国大革命时期并存的两个重大问题，二者相互依存，又相互牵制。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大革命的成败。这次会议对这个问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对国民党的错误认识，共产国际不允许破坏统一战线，致使土地革命无法开展，结果使土地革命服从了统一战线，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另一种观点认为，1926年底至1927年5月，共产国际要求通过国民政府自上而下地开展土地革命，这是可行的。关键在于要有强有力的组织保证。由于农民运动出现了若干“左”的倾向，给国民党右派“清党”提供了借口，导致一些本来可以联合的阶层倒向敌对方面，削弱了国民党左派的政治号召力，分化了统一战线，从而影响了国民政府推行土地革命的进程。而1927年5月以